



李 彬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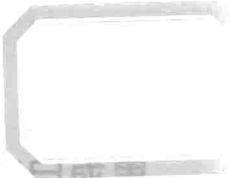
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

Arms Control Theories and Analysis



國防工業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教育部资助项目成果

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

Arms Control Theories and Analysis

李 彬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教育部资助的研究项目的直接成果。它系统地介绍了军备控制的理论源流及最新发展,从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分析了经典军控理论的基本框架,介绍了关于双边军控的核威慑理论、一般攻防理论,探讨了武器自杀伤效应导致的单边军控行为,并研究了经济因素对军备行为的影响。本书还分析了建构主义理论在军控研究中的应用,介绍了军控研究中不同于国家利益的其他研究出发点,包括全球安全、人的安全、国内政治因素等。本书强调理论和分析手段的可操作性,可供国际关系及国防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学习使用,也可供军备控制及国际安全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李彬著.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9

ISBN 7-118-04785-6

I. 军... II. 李... III. 军备—控制—理论研究
IV. E1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2490 号

※

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8 $\frac{3}{4}$ 字数 240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010)68428422

发行邮购:(010)68414474

发行传真:(010)68411535

发行业务:(010)68472764

自序

战略军备控制曾经是冷战期间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主题。学者们对战略军备控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以战略稳定性为核心概念的经典军备控制理论。这一理论也的确成为美、苏(俄罗斯)之间在冷战及冷战后一段时间战略军备控制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旨在消除核威胁的反核和平运动蓬勃发展,由大国主导的不扩散体制也逐渐成型。前者演化出全球安全、非传统安全等新的安全观念;后者则向安全领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寻求答案。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军备控制条约的发展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而军备控制的形式则不断扩展,新的军备控制现象也不断呈现。在理论上,除了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继续为军备控制研究提供工具和思路,建构主义等新兴国际关系理论也试图对军备控制的动力和原因给出解释。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系统地整理这些理论发展和实践动态,并将其用恰当的逻辑框架呈现出来,使我们对军备控制发展的全貌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本书也力图指出一些军控理论所存在的缺陷以及在应用中所出现的困窘。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参与全球军备控制的谈判和讨论,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实质性地参加国际军备控制体系。我国对军备控制持积极态度有着国内的和

作者简介

李彬 北京大学理学硕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博士,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

1990年开始从事军备控制研究,曾参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曾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军控室主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学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现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军备控制项目,还担任《科学与全球安全》(*Science and Global Security*)、《不扩散评论》(*Nonproliferation Review*)杂志编委。

国际的深刻原因。在国内,各个阶层都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因此,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军备控制是维护这种和平环境的重要工具。在国际上,由于美国再次进入军事扩张期,中国需要依靠国际合作来减缓安全压力、避免军备竞赛。因此,军备控制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重要工具,因此受到政府、学者的充分重视。军备控制的学术和政策研究成为当前的显学,国内对军控的学习和研究资源的需求日益扩大。经典的军控理论首先成为国内学者关注和借鉴的对象。可是,中国的实力地位和当今的国际格局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承袭经典军控理论。首先,中国的军事实力在世界上往往被看作位于第二个阶梯,这就使得与中国相关的军控问题常常是不对称的。其次,与中国实力相当的国家较多,因此,与中国相关的军备控制常常是多边的。因此,冷战期间发展起来的两极对称的经典战略军控理论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为此,我们至少需要重审经典军控的一些基本概念,扩展或者重建一些基本假定,使得新的理论能够描述中国所面临的军控问题,这样才能为我国的军控研究服务。本书力图将已有军控理论中重要的假定和概念进行扩展和重建,使得我们能够运用这些理论研究我国所面临的军控问题。本书包括了我在扩展军控理论以及应用于中国面临的军控问题方面所做的尝试。

一些特定的军控主张在特定的时期对某个国家有利,因此,这一国家可能会在这一时期坚持和提倡这一主张。但这并不表明该主张背后的理论基础为该国所独有。其他国家同样可以在不同时期对这一理论加以研究和利用。军备控制有不同的出发点、思路和视角。其中一些适合特定的场合和时代环境,因此,在这些场合和时代,相应的理论就发展得快一些、被应用得多一些。此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学术研究比较发达,当地学者对军控理论发展贡献比较大,但这些并不表明,该理论隶属于特定的地区,例如,出现所谓的“西方军控理论”。除了军备控制的国别理论(例如,根据特定国家的军事、政治特点研究该国军控政策的理论)之外,所有的军控理论应该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术要求。试图区别中国军控理论和西方军控理论可

能是无法实现的,甚至是有害的。例如,战略稳定性曾经是冷战期间美苏军备控制的一个基本思路;冷战结束后,中国同样主张维护战略稳定性。试图人为地划分中国军控理论和西方军控理论,有可能限制我们的思路、阻碍我们的对外交流和宣传。本书尽量以中国所面临的军控问题为例来阐释军控理论框架和逻辑结构,这是因为我主要关切的是中国面临的军控问题,而不是试图建立区别于西方的中国军控理论。本书列举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案例来阐明现代军控理论,也不是要说明现代军控理论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排斥现代军控理论,而且还能为现代军控理论的发展提供养料。

军备控制是一个应用性的领域。军备控制研究往往带有一定的政策关联,否则,很难在军备控制领域产生影响。因此,本书大量给出有政策含义的案例来说明理论框架和分析思路。军备控制领域的很多流行的说法常常由实践者倡导,而不是由学者事前根据学术传统界定好。很多时候,军备政策的实践者会采用一些不符合学术传统的名称,这时,学者往往难以“纠偏”。因此,在行文和阅读的时候,需要关注和体察这些“例外”。本书在介绍军备控制术语的时候,尽量照顾流行说法,按照应用的特点给予解释,避免生造词汇。军备控制本身是具有立场和倾向性的,我也无法完全回避这一点。但是,在介绍理论框架和分析思路时,本书则尽量排除立场倾向对原有逻辑完整性的破坏。

军备控制问题涉及大量的科学技术基础。本书在阐明一些概念和规律的时候,也从物理现象开始进行展开,目的是为了更加准确地给出军控问题的基本图像。但技术研究方法不是本书介绍的重点。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参考杜祥琬院士编著的《核军备控制的科学技术基础》。很显然,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基础有利于军控研究,也便于理解军控理论。但是,这并不是说科学技术是从事军备控制研究的唯一的角度。实际上,军控研究有很多其他的角度。有的时候,面对相同的物理环境,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军备政策主张。这表明,物理因素不是决定军备行为的唯一原因。事实上很多因素共同左右着一个国家的军备行为。不同的军控理论着重关注军备现象中特定的

因素。在专门针对某一类因素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成熟的理论会逐渐形成一套专门的分析方法。本书在介绍军备控制理论的同时,会介绍与其相适应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军备控制研究。对一些学生来说,军备控制现象似乎比较神秘,因此,他们对军备控制研究感到畏惧,或者感到无从入手。造成这种印象的,除了对军备控制现象了解不多之外,主要的问题是对军备控制研究的分析方法不够了解。本书力图介绍各种理论框架下常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如何确定核心概念、如何进行研究层次的展开,以及如何寻找相应的研究工具。对于各种分析方法,本书都力图给出完整的框架和思路,并提供一些研究案例。基于不同的理论进行军控研究,所倚重的方法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理性主义的一些流派,习惯于从物质特性出发来考察不同军备策略所带来的安全效应,基于这些理论的军控研究常常会采用技术分析的成果。建构主义关注人们的观念,因此,基于该理论的军控研究会较多地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了解人们对各种军备现象的反应。本书大体上按照理论和领域的划分来介绍相应的分析方法。

我从1990年开始师从杜祥琬院士学习军备控制。当时,国内在军备控制方面的学习资源极其匮乏,更谈不上教材建设。杜老师多方搜集资料,保证让我们系统地学习军备控制的知识,并努力创造条件,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军控实践。杜老师的帮助使我能够有机会参加当时国内最高水准的军控讨论,得到胡思德院士、宋家树院士的指点,其后,还能够参加由钱绍钧院士直接领导的军控对策研究,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军控研究打下了基础。杜老师还帮助我进入国际军控学术交流的圈子,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国外最著名的军控专家,向他们学习。1994年,在戴维·莱特(David Wright)博士等的指导下,我成功地申请到SSRC/Mac Arthur博士后奖学金,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在泰德·波斯托尔(Ted Postol)教授、乔治·刘易斯(George Lewis)博士的指导下,进行军控方面的学习和研究;1995年转到普林斯顿大学,在弗兰克·冯·希伯(Frank von Hippel)教授、哈尔·费弗森(Hal Feiveson)博士的指导下开展军控研究。我的这些师长们不仅帮助我进入了军控这一领域,而且帮助我懂得了通过

交流来实现合作这一看似简单、其实却很深奥的道理。本书实际上也一直在试图阐明这一道理。

1996年我回国之后,很快就被选派参加《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信任与荣誉。现在,我已经离开“国家队”,成为一个以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为主要任务的高校教师。但是,我参加军控对策研究和谈判的实践经历仍然让我受益匪浅,使我能够更加务实地进行军控研究和教学。本书对军控理论的一些阐释很自然地融进了我参与军控实践所得到的感触,希望这一特点有助于读者理解军备控制的逻辑。

我从2001年开始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讲授军备控制课程,并指导研究生,这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新阶段。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的学识和领导方式对我帮助很大,使我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广泛涉猎自己感兴趣的军控领域。国际问题研究所教学的需要以及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使我不得不考虑一些原本不在我关注范围之内的军备控制的复杂动因。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氛围也促使我学习并扩展了自己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了解。本书实际上是我在清华大学五年来军控教学实践的一个总结,很多论述是针对学生的提问而展开的;一些研究案例来自于学生的论文。我从2001年开始组织针对全国年轻学者、学生和官员的军控暑期班。从中,我能够体会到这些年轻人希望提高军控研究能力的渴望,也了解了他们开展军控研究的障碍。他们一个共同的需求是希望更多地了解军控的基本情况和具体案例。但是,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往往有不同的需求。对国际关系领域的年轻学者而言,他们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们感兴趣的是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军备控制实践互相印证。对其他专业的学生(例如,理工科专业的学生)而言,他们需要的是了解军备控制的动因,即为什么需要军备控制,或者怎样才能出现军备控制?在此基础上,他们才容易在军控中找到适合自己专业特长的研究题目。本书努力为这两类专业背景的学生、学者提供思路,根据国际关系理论来说明军备控制的动因。希望这样的设计能够帮助年轻学者更好地设计和改进自己的研究。

学习军备控制可以从专题入手：首先了解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然后，触类旁通，向其他专题扩展。大多数军控专著都是为了满足这样的学习需要，按照专题来组织章节的。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介绍军控的内容，因此，不按照专题来组织章节。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整理和介绍军备控制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因此，本书大体上按照理论流派来组织章节。需要了解军控专题的读者可以参考潘振强的《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夏立平的《亚太地区军备控制与安全》，技术角度可以参考杜祥琬的《核军备控制的科学技术基础》，快捷的途径是参考刘华秋的《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本书各个章节在涉及到各种军控问题的时候，也给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本书第一章介绍军备控制的基本概念、形式以及军备控制的学科位置；第二章介绍军备控制中最常用的理性主义理论及分析方法；第三至七章介绍理性分析的应用；第三章从理性角度探讨国家之间的互动，第四章介绍经典军控理论，第五章介绍攻防关系，第六章介绍军备产生负面安全效应的情景，第七章讨论军备与经济的关系；第八章则探讨了理性主义理论的不确定性；第九章介绍建构主义理论在军控中的应用；第十章介绍全球安全、人的安全等不同安全关切对军控提出的要求；第十一章介绍军控中非国家层次的因素。

本书可以作为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以供其他专业有兴趣进行军控研究的研究生学习，也可以供在军控以及相关领域从事研究的专业人员参考。

在过去的一些年，麦克阿瑟基金会、犁头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资助了我在清华大学开展的军控研究和培训工作，使得我能够保持学术上的活跃，并能够广泛接触军控领域的老专家和新成员，了解最新的军控研究进展。这本书是教育部资助的研究项目的直接成果，使得我多年的军控研究、实践和教学的成果能够凝固下来，在此深表感谢。

我要感谢父母。我能够成为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城市中无职无业的人，首先是父母在贫穷中培养了我的进取心。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她陪伴我辗转各地多年，给我学术上的鼓励，带给我一些在专业领域可能学不到的知识。相信一些读者能够体会到本书中那些

“功夫在诗外”的知识。我还要感谢我的儿子，我在忙于本书的时候，一定常常忽略他，而他宽和、开朗的性格却常常给我带来抚慰。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为本书提出了需求，而且是本书的第一批读者。

2006年8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军备控制的概念及其方式	(1)
第一节 军备控制的概念	(2)
第二节 军备控制的方式	(9)
第三节 军备控制与社会科学	(15)
第四节 军备控制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18)
第二章 国家安全及其理性分析方法	(21)
第一节 国家安全相关的基本概念	(21)
第二节 国家安全政策的理性分析方法	(26)
第三节 理性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	(37)
第三章 安全互动与军备控制	(47)
第一节 军备的效应与效能	(47)
第二节 战略分析	(52)
第三节 安全困境与多边军备控制的成因	(57)
第四章 核威慑理论和战略稳定性	(66)
第一节 核武器的作用	(66)
第二节 核威慑的理性分析及其条件	(72)
第三节 相互确保摧毁与危机稳定性	(77)
第四节 战略稳定性及其应用	(83)

第五章 进攻与防御的关系	(89)
第一节 战略导弹防御与《反导条约》	(89)
第二节 导弹防御与战略稳定性	(95)
第三节 一般攻防理论	(104)
第六章 军备与国家安全关系的进一步考虑	(113)
第一节 武器作用的逆序	(113)
第二节 外空战的后果	(124)
第三节 非传统安全	(128)
第四节 防止核恐怖主义	(132)
第七章 军备与经济	(136)
第一节 资源限制与单边军备控制	(136)
第二节 军备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145)
第三节 军备互动中的经济因素	(152)
第四节 出口管制	(158)
第八章 获益关切对军控决策的影响	(168)
第一节 可增殖的利益及其排序	(168)
第二节 威胁增殖与相对获益	(173)
第三节 美国对华安全政策中的相对获益现象	(179)
第九章 军备决策的社会建构	(185)
第一节 偏好排序的社会建构	(185)
第二节 认知与军控决策	(196)
第三节 特定圈子的简便决策依据和思路	(199)
第四节 规范、身份认定与军控决策	(207)
第十章 多层次的安全与军备控制	(215)
第一节 全球安全与全球治理	(215)
第二节 人的安全	(227)
第十一章 军备控制的多层次参与	(238)
第一节 军控决策的国内参与者	(238)
第二节 多层次的军控外交	(250)
第三节 作为公共政策的军控政策	(259)
图表索引	(265)

第一章

军备控制的概念及其方式

军备控制是一个应用性的领域。军备控制的相关概念主要来自实践,而不是由学者先进行定义然后再实施应用。因此,这些概念往往具有一些不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在实践中,具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以及不同的学科圈子由于出发点和习惯不一样,可能会各自偏爱或反感一些概念,因此,对同样的概念可能会形成各自不同的用法。例如,军备控制、裁军、不扩散这三个概念有时是并列使用的,有时则可以用其中任何一个来涵盖其余两个。不同的圈子会有倾向性地偏重其中一个概念。这样,在应用中,同一概念可能会带有不同的含义。一些法律文件中的一些概念可能是明确的,例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扩散”指的是无核武器国家获取核武器。但是,这种界定未必能普遍适用。很多时候,“扩散”也指核武器国家发展核武器的现象。

尽管对不同的圈子而言,或者在不同的时间里,军备控制相关概念有所漂移,但是,它们的含义仍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或者说,其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往往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本章主要根据实践中比较普遍的用法来介绍军备控制相关概念的含义,并介绍各种说法所隐含的倾向性以及各个概念本身可能具有的模糊性。

第一节 军备控制的概念

长期以来,军备控制(简称军控)是根据目的与手段两个方面来给出定义的。目的有时指增加国家安全、有时指增加国际安全(减少战争),而手段主要是指合作性(例如,国家之间达成某些一致)。经典的军备控制著作《战略与军控》^①就是这样给出军备控制的定义的:潜在敌手之间为了降低战争的可能性、战争的范围与烈度(如果战争爆发的话)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军事合作。从目的来定义军备控制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它不能涵盖日渐丰富的军控内容。除了军事安全这一基本的因素外,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人道主义因素、环境保护因素等非军事因素也在军备控制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前以军事安全为指导思想的军备控制发展势头受阻时,以非传统因素作为基本考虑的军备控制正引起关注^②。例如,《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的目的主要不是增进国家安全,而是增进个人的人身安全。而人们普遍地、理所当然地将《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看作一项军备控制条约。此外,在一个国家具有基本安全感的前提下,尤其是安全感有所增加的前提下,经济因素可能成为推动军备控制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军事员额裁减一百万的庞大裁军行动,其出发点就是“把经济搞上去”。在冷战结束前后,以降低军费为目的的军备控制开始成为全球军备控制中的重要内容。经济因素对军备控制的影响还表现在,当一国的经济出现下滑甚至危机时,它可能降低军费开支、减少对军备的投入,从而出现军备发展的自我克制。始于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使受冲击国家紧缩国防开支。现在,人们在讨论军控问题的时候,并不刻意排除基于经济目的的行为,甚至很多军控倡议将节省资源作

① Thomas C. Schelling and Halperin, Morton H., *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 Reprinted by Twentieth Century Fund, Inc., 1985.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Kraus Reprint Co., Millwood, N. Y. 1975. p. 2.

② 参见周宝根、李彬:《党派政治对冷战后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4期,第62—65页。

为军控的一个主要目标以便获得广泛的支持。这些以经济因素为主要目的的控制军备的行为也不容易被上述定义所涵盖。

从目的来定义军备控制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其主观性太强。同一个军控倡议,不同人的评价差别会很大:有的手段被一些人看作是合作性的而且能够增进国家安全,而被另外一些人认为是欺骗性的而且会损害国家安全。因此,这种定义方式可能带来操作上的困难,不利于观点不同的人之间的讨论。本书在定义军备控制的时候尽量寻求客观性描述,以便使得这个概念在运用时具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同时,本书也寻求比较广义的定义方式,以便反映日益丰富的国际军备控制现状。

近些年出现的对军备控制的定义不再强调目的。例如,最近出版的《军备控制:变化环境中的合作安全》给出的定义是:国家之间为调控军事实力或军事潜力的某些方面而达成的一致^①。刘华秋主编的《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也强调军备控制需要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国际协定对武器各个环节和过程进行限制^②。这样新的定义并不那么强调军备控制的目的性,但是,仍然强调国家之间的一致,因此,这些定义不包括单边的军备控制。美国和前苏联(俄罗斯)在冷战结束时所进行的单边战术核武器裁减、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多次大幅度裁减军事员额。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军备控制行为。但是,它们都不是根据国家之间达成的一致而履行的承诺。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目前禁止核试验的状况。现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仍然没有生效。在面对关于核试验指控的时候,一些国家进行澄清的依据仍然是它们单方面做出的暂停核试验的承诺^③。尽管单方

① Jeffrey A. Larsen, ed., *Arms Control: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Boulder. August, 2002. p. 1. 该书部分章节有电子版: http://www.ccc.nps.navy.mil/publications/books/armsControl_exc2.pdf.

② 参见刘华秋主编:《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③ Eileen O'Connor, "U. S. Asks Russia about 'Seismic Event', Moscow Denies Nuclear Test Took Place," *CNN World News*, August 28, 1997. <http://www.cnn.com/WORLD/9708/28/russia.nuclear/>

面的暂停核试验的承诺不如正式的、多边的、具有核查安排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更可信,但是,单方面的承诺或者行动同样可以具有控制军备的实质。例如,暂停核试验使得做出这种承诺的国家难以通过核武器爆炸试验设计新原理的核武器。因此,我们似乎不应该将单边的限制军事能力的行为排除在军备控制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冷战结束后世界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也由于美国政府中一些人反感军控条约,以条约为基础的军备控制目前处于颓势。非条约的军备控制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会是一种重要的军备控制形式。如果拘泥于条约的形式,或者以多边一致作为必备条件,恐怕不能准确反映今后一段时间军备控制的状况。此外,有的时候,一些国家由于社会压力而不是因国家间的协议而不能随意发展或者使用军备,这就是所谓基于“禁忌”的军备控制。这种现象在过去一些年得到了深入的研究,本书后面将就此进行专门的讨论。从这种基于“禁忌”的军备控制中不一定能够清晰地找到不同国家所做出的一致性的承诺。但是,我们也不宜排除这种形式的军备控制。

本书中,军备控制(arms control)是指对武器及其相关设施、相关活动或者相关人员进行约束。例如,对军备的研究、生产、储存、部署、使用方式等进行约束,或者为其他国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提供方便,都可以被称作军备控制。这里给出的定义方式是一种客观性描述。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观察到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实体、部门)对军备从研究到使用的某些过程进行约束,我们就将其看作是军备控制。这里,我们并不因为实施控制的动机有所不同而认为它们就不是军控。不管是为了增进国家安全、是迫于国际压力、是受经济实力的限制、是为了环境保护、还是国内政治的需要,只要这种约束存在,我们就将其看作军控。这种定义方式避免了由于对动机考察的困难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应用中比较具有可操作性。此外,这个定义并不限于国家之间的协定,因此,也更能反映各种类型的军控形式,尤其是不存在条约的以及未宣布的军控。这种广义的定义更能反映日益丰富的军控内容。

由于上述定义不基于对目的考察,因此,它会自然地包含一些被动的约束军备的行为。甚至,上述定义也没有排除这样的行为:一